

敘說緣起

幾年以前，我開始為孩子們寫下我在怡保成長的故事。我知道這也是為了自己而寫，因為過程中我努力回想父母當年的樣子。我和父母同住一城的歲月，除開1948年間的九個月，只有孩提時代到十九歲為止。我覺得應該告訴孩子，離家前我的世界有多不一樣，好讓他們瞭解對身為孩子的他們而言，有什麼變了，以及對身為父母的我們而言，又有什麼變了。內人媽婷 (Margaret) 知道我的故事，也贊成我應該趁着力所能及把故事講出來。

之所以決定出版這個故事，是因為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碰到一群文史工作者，他們讓我更加意識到過往歷史裏的個人層面。我大半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覺得過往十分迷人。我想要為自己，也為那些和我同樣渴求知識的人們剖析世間萬物的道理，然而我感興趣的道理總是如此宏大，甚至令人生畏。即使讀到王侯將相和市井小民的人生，我看待他們時也保持批判的距離，希望從中學得更大的教訓。隨著時光流逝，我終於瞭解自己對過去的理解多麼片面：我的研究理路主要依循歐洲歷史學，也有儒家修身背景賦予的一些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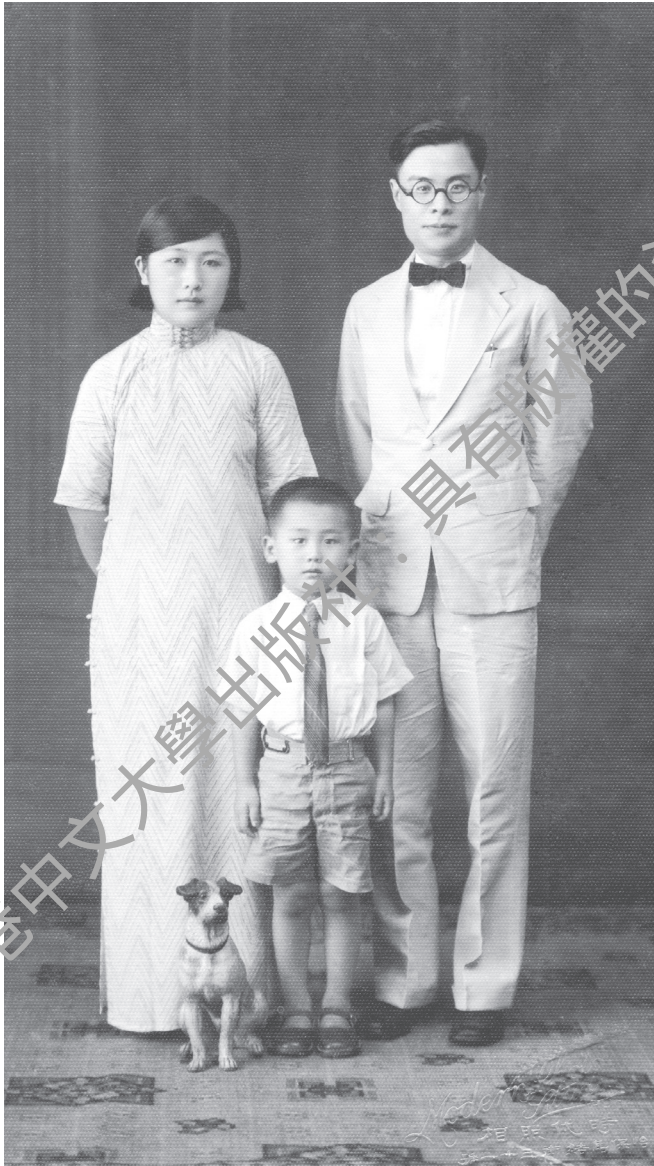
這些從事文史工作的朋友提醒了我，我們誇誇談論歷史的重要性時，其實無感於親身經歷某段歷史時期的人們有什麼感覺、有什麼想法。我們往往訴諸文獻，試圖以此捕捉苦與樂的時刻，儘管這有助我們想像他人過往的片段，但我們太缺乏人們實際經歷的故事。關注地方文史遺產是第一步，鼓勵大家分享人生或許可以是下一步。我開始覺得，也許家族外的人也會對我為孩子寫下的故事感興趣。因此我着手完成故事，寫到1949年離開怡保赴新加坡，就讀新成立的馬來亞大學為止。在那之後，我的父母移居吉隆坡，再也沒有回怡保。為了讓這個故事適合更廣大的讀者群，我竭盡所能地修改並補充故事的各個篇章。



很多朋友跟我說，真希望當年父母還健在時多和父母聊聊，我記得自己在青少年時期想法正好相反。那時候我覺得母親太常講起中國，卻太少講到我真正想知道的事。不過我記得當時好希望父親可以說說他自己的事，尤其是他在長江流域成長的中國童年。父母兩人都熱愛他們的中國，而且就我記憶所及，他們一直夢想能回到家鄉。

在我心中，中國的不平衡讓人不可思議。母親眼中的中國，是她害怕會消失的傳統中國，她希望自己的獨生子對此能多少有所瞭解。母親將之視為職責，要讓我盡可能多認識中國，因為我是生長於異鄉的孩子。

我覺得應該把故事說出來，讓我的孩子能讀到這一切的來龍去脈。我一邊寫，一邊後悔沒有趁父母在世時多和他們聊聊。母親最



我和母親丁儼、父親王宓文。攝於1930年代中期，我們剛搬到怡保不久。

後確實寫下了她的人生故事，我也為孩子翻譯了一部分，作為本書的內容。¹真希望那時要母親多和我說說這些事。但我最覺得可惜的還是沒能多聽父親講一講個人的事情，說說他的夢想，還有他的成長過程是什麼樣子。有時真希望父親在我面前展現的是他真實的自我，而不要活得那麼謹守他心中儒家父親的典範。如果他願意談身處動盪時代，自己如何從孩子變成大人，我一定聽得津津有味。或許是這分失落感驅使我說出這個故事。



母親在1993年9月撒手人寰。臨終之前，她把1980年完成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留給我，那是她用非常工整的小楷為我寫下的回憶錄。她說她有好多人生故事想讓我知道，但我們從未久坐長談，因此無法好好把故事告訴我。我滿懷悲傷捧讀回憶錄，因為從未聽母親當面講述而錯過了她人生裏的好多環節。運用回憶錄的段落，我將母親人生的關鍵時刻轉述給內人和孩子知悉。為孩子寫下我的故事時，我進而翻譯其中的相關篇章，讓孩子能讀到祖母記憶中的故事。這樣對孩子來說更為真實，因為他們有機會親身閱讀祖母的文字，能夠更清楚知道對我而言她是怎麼樣的母親。決定將成長故事付梓時，我認為也應該將母親的故事放進來，附在我寫的故事之後。

我記不清母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告訴我她的故事，但我想應該早在我五歲上學以前就開始了。母親說故事是為了讓我對中國的家人有

1 中文版逕用作者提供的手稿原文。——編註

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

No.

我原籍江蘇鎮江因太平天國之亂祖上遷移來台
 計已百餘年該地風氣閉塞新式教育不發達我
 雖生長在書香小康之家但家庭守舊對女子赴外
 地求學毫不贊成以致未能受較高教育至今思之
 仍以為憾我二十三歲出嫁時對處理家事毫無經
 驗因燒飯洗衣均有工人代勞加之慈母寵愛不令
 操作養成不理瑣事之習慣大有藪麥不辨之慨幸
 以後逐漸改變尚不致完全外行也我於一九二九年
 二月結婚以前彼此從未見面居然相處感情不錯
 互相關懷互相敬愛甘苦與共數十年如一日汝父
 曾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正在秦縣兩縣學任教原
 本係數代同居之大家庭我到汝家時老家已分居
 數年其時家中祇有祖父母與伯祖母及叔父叔母
 姑母同住一宅相處數月甚為和睦並不感生疏之
 月初聞外祖母病重我即趕回侍疾不數日而棄養
 我在家悲痛守孝時接汝父函告已得同學之父喬
 陰剛君來信謂已推薦汝父往荷屬泗水華僑中學
 任校長正式聘書業已到達並有旅費三百元因國
 內正僧多粥少之時雖鄉背井亦樂意接受亟急整

但

母親丁儼的手稿〈略述我五十年之回憶〉第一頁。

所瞭解，讓我為返回中國做好準備。她想確保我看見她認識的全貌，好知道該抱有什麼期待。假如我有妹妹，也許母親就不會跟我說這麼多了。但因為我是獨生子，她又離家迢迢，沒有其他人聽她說故事，所以她必須確保我不會忘記她告訴我的種種。我們是第一代核心家庭，父母兩人則成長於大家庭，和許多近親同住一個屋簷下，同堂的至少有三代。其他親戚都住在附近，所以通常也不需要多說親戚的事。

有好多故事母親都再三重複，確保我領會。對她而言，這是一種文化傳承實踐，因為我從來不覺得她說故事是為了讓我覺得有趣。母親的一言一行在在散發濃厚的責任感，我不久便瞭解到她在教育我認識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父親的兒子，來自深深紮根於傳統中國的家族。她希望讓我知道自己在王氏家族的定位，也希望為生在遙遠異鄉的兒子盡好自己身為中國母親的本份。

母親從自身的故事開始說起。母親名叫丁儼，家人叫她丁佩蘭。她出生在江蘇省東台縣城，東台是濱海城鎮，地處長江以北約五十英里，離父親的故鄉泰州不遠。東台地勢低平，接近沿海分佈的鹽田，那是丁家十九世紀享有的財富泉源。丁家來自鎮江，鎮江是長江三角洲的大城市，位於長江和大運河交會處。丁家祖先裏不乏曾任鹽運使司衙署官員者，其中一些人去職之後仍然和鹽業保持密切關係。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軍逼近鎮江時，母親的這支丁家人離開鎮江，前往東台。

丁家由成功的文人領導，他們期待家裏的年輕子弟專心研讀典籍，以圖仕進，不過也有和鹽業關係密切的丁家人。清廷在1904年之後廢除科舉考試，丁家子弟仍因循舊規，繼續讀書；一部分是家族

傳統使然，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不過還是有比較務實的丁家人，他們轉向商業投資，而這幾支丁家直到民國初年都還十分富裕。

母親的大哥恪守傳統。她告訴我大哥要在瞬息萬變的中國謀生時，有多麼手足無措。這喚起了她個性中務實的一面，讓她對中國青年男子應該讀什麼書感到非常矛盾。考慮到大哥的狀況，她的觀點是如果孩子對讀書缺乏天分和興趣，那麼應該建議他學些實用的技能，而不該一味逼他讀書。母親還有個跟她一樣務實的妹妹。她很喜歡妹妹，也認同妹妹的職涯選擇：在地方政府當小職員。

丁家三個孩子出生時，家產仍然富裕定局，每到吃飯時間，全家超過百口集合在有數重庭院的大宅裏。說到宅裏用鑼聲招喚家人集會用餐，母親甚至語帶敬畏。男人在正廳的餐桌上吃飯，母親則和她的母親、妹妹在內廳同其他女眷一起吃。然而好景不常，母親這代是沾得這種家族庇蔭的最後一代。吸食鴉片漸漸荼毒家裏的男丁，甚至也禍及一些女眷。清朝覆滅後動亂不已，加上軍閥各據山頭，讓地方駐紮的軍人得以在地盤內任意向商人和鄉紳地主「徵稅」。

軍閥苛捐加上鴉片煙害將東台丁家推上末路，不過母親記得鎮江的老家多捱了一段日子。母親述說的丁家故事摻雜憾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如何嚴詞批評某些宗族長輩。她一再重申鴉片的危害、種種鋪張浪費、財務管理不當、大家族規模過分膨脹，而最重要的，是丁家男人無力適應這一隅中國瞬息萬變的局勢。

丁家傳統上依循儒家教導，也囿於此一窠臼，大家期待兒孫用功讀書，求取功名。她的父親在研讀經典方面的表現稱不上優秀，因此

被鼓勵去幫忙家族經營鹽業。1905年母親出生時，家境依然富裕，但不久之後，丁家從前和官僚的關係隨着清朝垮台而斷裂。其後，她的父親和叔伯、堂兄弟竭力維持生意運轉，以維繫大家庭。這是場沒有勝算的戰鬥。他們需要新的商業能力，但家裏出不了真正具有企業才幹的人才；面對袁世凱總統治下不穩定的民國政權和後繼掌權的軍閥，他們也欠缺與之周旋的必要關係。丁家上下只知道固守儒家價值，讓他們的子孫準備好展開某種書中自有的事業。他們或許預期帝國傳統有所改良，但仍在能夠適應的範圍，似乎從不懷疑儒家的中心思想依舊會是政府的指導原則。

滿清統治結束以後，確實有件好事發生在母親身上。縱然王朝已傾覆，又儘管民國政權支持一概終止婦女纏足的激進呼籲，但家裏仍舊安排讓母親裹小腳。聽到自己必須遵循習俗時，母親向外祖母哭泣哀求。母女兩人皆泫然落淚，但外祖母不改心意，纏足照舊進行。疼愛母親的僕人不忍見到母親哭泣，也向外祖母求情，她指出附近一些人家已經中止這項陋習。外祖母最終讓步了。我覺得母親的腳很小，但她說不準如果腳從來沒被纏過，是不是可以長得更大。

母親在成長過程中，看見家族隨生意沒落而四分五裂。她看見大哥整理理首於儒家經典之中，唯一的樂趣消遣是書法和下棋。她和妹妹在家裏學會讀書寫字，母親對古今文章深有涵養，閱讀涉獵廣泛，甚至讀了一些她不該讀的傳統小說，像是《紅樓夢》。家裏期待她長大後要幫她的母親在持家上分憂解勞，因此她研讀女德的典籍，也學習一應家務和各種實用技藝，皆是打理大家庭所必需。她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是勤練而來的好書法，她寫得一手漂亮的標準小楷，這是丁家每

個女子都應該會的技藝。母親常常告訴我她練字有多努力，她和書法受到盛讚的堂姐一起練習，後來終於把字練到可與堂姐媲美。不過，母親承認她永遠沒辦法像堂姐一樣精通繪畫，堂姐不只是地方上的佳人，也被視為鎮上最有才氣的女畫家。1980年，我在上海再次見到這位堂姨，堂姨已經年近八十，依然美麗動人，她給我一柄親筆作畫落款的畫扇要我帶給母親，堪稱珍寶。

我終於在2010年4月造訪東台，卻遍尋不着母親口中的大宅和庭園。當地人告訴我大宅過去坐落何處，之後又怎麼出售改建。他們為我指出那塊土地上後來蓋起的房屋，現在住着幾戶人家。我遇見住在附近的某家人，他們還記得丁公館(丁家大宅)的故事。其中一個人帶我去看幾百碼外的小溪上的一座橋，仍然叫丁公橋，標示丁家土地的邊界。儘管不知道他們說的有幾分正確，但我所見的印證了母親的故事，還是讓我很高興。

這些故事大部分是在我成長過程中，在戰爭1941年延燒到怡保之前聽說的。最初的故事聽來趣味盎然，我們在怡保沒有近親，這些故事把我們小小的三口之家放進大網絡中，連結為數眾多的姨姑孀孀、叔伯舅舅，還有或親或疏的堂表兄弟姐妹。深一層的背景裏還有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其他祖輩親人。母親一絲不苟地教導我，要我認識所有分得清的親戚，每個親戚都有一兩則趣聞賦予他們鮮活形象，親戚個個都被精準定位，安置在以母親父親為中心以及最終以我為中心的網絡中。因此我的心靈世界住滿血親，母親那邊除了她的大哥和妹妹之外都暗淡不清，但多虧母親，父親那邊則鮮明清晰，溯及王家四代。

母親說起夫家的故事，總是比說起娘家的故事要更溫柔。這是因為她真的尊敬王家，還是因為她覺得自己身負儒家職責，必須教導我尊敬王家，對此我始終無法確定。或許兩種理由都有一點，因為王家從來不是富貴人家，但他們堅守儒家文人傳統，不碰生意也不沾鴉片——至少這是母親透過精心挑選的故事所留給我的正面形象。



父親名叫王宓文，字藝初，他對自己的事緘口不提，也不談王家的事，而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向父親問起他的青年時代。我對父親成長過程的瞭解均來自母親之口，母親對王家的好奇心驅使她把故事一點一滴拼湊出來。父親1903年生於泰州，1911年10月10日他和父母都在武昌（今武漢），那天爆發的革命最終推翻了滿清王朝。當時在武昌做生意的一位廣東朋友幫助王家九死一生地逃離武昌，回到泰州。我的祖父王海山（字允成）無望在政府謀得職位，轉而投身商場，經朋友介紹到銀行工作，不過在商界似乎不太順遂，之後又找了其他工作，但也沒有做出什麼成績。

父親之前在泰州時已開始讀書。他的叔祖父王宗炎（字雷夏）是當時的一方大儒，父親十分景仰叔祖父，因此就教於其子王冶山在武昌的學塾。父親在武昌學習經典，接受叔叔的指導，叔叔督促他熟習重要的儒家典籍，鼓勵他寫作古文，並教他賞鑒最出色的詩作，上自《詩經》，下至唐宋名家。父親師法叔祖父，學習顏真卿的顏體書法，之後又學古老的篆書。父親勤練篆書，從不間斷，我記得小時候每晚

飯後都會看到他練字。除此之外，父親也推崇家人鍾愛的六朝文學，終其一生都以六朝風格作詩。

到父親十二歲時，家裏認為父親的古典造詣已經足夠。回泰州之後，他進了當地一所現代新式學校，鑽研英文和數學，兩者對他都是全新的科目。2010年9月，我和家人一起參觀父親的母校，學校向我介紹官方校史，我發現過往教師裏有好幾個王家人的名字，父親也名列其中，1925年父親剛從大學畢業時曾在此短暫執教。

從泰州的學校畢業之後，父親獲得一筆獎學金，可以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年該校改組為國立東南大學，即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也就是父親之後決定要我就讀的大學。父親在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教育，大學當時的校長郭秉文曾經赴美深造教育哲學，就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保羅·孟祿(Paul Monroe)等學者。郭秉文校長邀請這兩位學者來此講學數月，讓國立東南大學以全國最進步的教育中心之姿聲名遠播。

父親說起郭秉文時語帶崇敬，他說郭校長延聘同為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的陶行知來領導教育學院。據父親說，陶行知引介了當時急需的教育方法革新。父親常常告訴我他受杜威之啟發有多深，杜威是陶行知的老師，將教育哲學最新潮的觀念傳授給中國整整一代的老師。我不知道父親在中國和馬來亞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年輕教師，但我知道1959年他擔任柔佛州新山寬柔中學的校長時，實踐了他自由主義的主張。他在引進教與學的方法上饒有貢獻，為學校贏得美譽，至今不墜。

就我而言，可以說父親對我的教育確實十分開明，賦予我極大的自由，可以開心上學，讀想讀的東西。這點常引起母親擔憂，母親覺

得我的生活需要多點規矩，但父親極力避免讓我接受他自己不得不經歷的那種傳統教育。中國遠在他方，即使父親真的想讓我接受傳統教育，恐怕也困難重重，不過，父親實踐了自己的信念，選擇送我去上英文學校，現代教學方法正在英文學校裏漸漸站穩腳步。

父親當年之所以選擇念英國文學，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已經足夠，需要轉而多瞭解外面的世界。他做這個決定時深知國立東南大學以漢代之後的文學見長，擁有許多優秀學者，尤其專精於他鍾愛的六朝，而他對六朝詩的愛好始終不減。父親轉向英國文學後，特別關注詩歌的發展。他受教於曾留學哈佛的教授，像是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的學生吳宓，後者將比較文學這個領域引介至中國。回憶起英文系的學生時光，父親滿懷情意，遙想一位年輕的美國教授羅伯特·溫德 (Robert Winter)，溫德教導他莎士比亞、彌爾頓、蒲柏和浪漫主義者 (主要是華茲華斯和柯立芝) 的詩作，還告訴他中國對艾茲拉·龐德詩作的影響。這些都讓他心中的浪漫面向更加堅定，我認為他也深受溫德自由主義理想的影響。一邊是養育他的傳統，另一邊則是英國文學為他開啟的想像世界，終其一生，這兩者的衝突始終存於父親心中。

長大之後，我開始瞭解，父親雖然鮮少談論政治，但心底十分愛國。我認為他的愛國情懷來自大學時代的經驗，以及他對華南國民革命軍的欽佩：軍閥割據中國，致使中國無力抵禦外侮，而國民革命軍最終推翻了軍閥。國民政府發動北伐，1927年拿下南京，終結了荒廢的十年；在北伐之前，父親就已去國到南洋執教。畢業後他的確曾在泰州教過一陣子書，後來又任教於南京的鍾南中學，在南京期間，他受到鼓勵前往東南亞，教育南洋華僑的孩子。

父親熱心支持華僑教育，在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展開新事業。他在新加坡得知陳嘉庚的慈善工作，包括幾年前陳嘉庚出資創辦廈門大學。父親後來告訴我他開始讀林文慶的著作，林文慶是新加坡的土生華人 (Peranakan Chinese) 知識分子，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父親讚賞林文慶能將西學素養和對儒家規訓的信念相合璧的才學，尤其欣賞林文慶翻譯的楚辭《離騷》(傳為戰國時期知名楚臣屈原之作)。林文慶能夠識認詩中提及的諸多草木花卉，也令父親嘆服。

父親也到馬六甲教書，任教於培風中學。該校由當地社群的頭面人物創立，其中一位創辦人之子沈慕羽是父親最喜愛的學生。沈慕羽後來成為教育領袖，熱烈支持父親在寬柔中學的工作，是戰後和馬來西亞獨立後推動華文學校發展的關鍵人物。

父親剛到馬來亞的頭幾年單身未婚。不過到了1929年，他獲聘為華僑中學校長，這是荷屬東印度爪哇島泗水的第一所華文中學。現在他的收入足以負擔成家所需，於是他回到家鄉泰州拜見祖父母，迎娶了母親，這是祖父母為他選擇的對象。祖父沒有工作，家裏十分窮苦。考慮到家人生活拮据，父親在外賺取的收入十分重要，因此婚禮之後他並未久留，迅速帶着妻子一起回東南亞。

和英屬馬來亞的華人不同，爪哇多數華人都在當地出生，而且灰都已有數代僑居海外。荷蘭人和印尼人(爪哇人)對待土生華人的態度也和對待新移民的態度迥然不同。在爪哇，政治忠誠錯綜複雜。荷蘭人多年來教育土生華人把眼光投往西方，但新移民卻緊逼所有華裔都要愛國——愛中國。與此同時，年輕的印尼民族主義者堅信人人皆應效忠他們即將建立、後來被稱為印尼的新國家。華

文中學身處這種狀況下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找出答案就是父親的任務。

在泗水以及後來在怡保，我們與非華裔的人，還有客家人、廣東人、閩南人和其他華人住在一起，在他們眼中，我們有點奇怪。父親是老師，因此大家對他總是恭恭敬敬；至於母親，儘管也受到大家善意相待，她卻覺得應該盡早回中國為上，以免日久兒子完全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父親也和母親一樣擔心，認同我們應該早日返回家鄉，不過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父親樂觀得不可思議，相信他可以傾囊把真正重要的中國教給我，也就是古典文學和儒家思想的中國。父親似乎認為，只要能把文化遺產的核心傳授給我，就無需擔心我會走偏，而必定會令我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因此，他一面信心滿滿地送我去上當地的英文學校，一面等待回中國的時機。父親欣賞英國文學，但他自己是從少年時期才開始學英文。他認為如果情況許可，應該讓我有機會早點開始學英文。父親似乎相信中英文學底蘊的結合會是個好起點，讓我更能適應現代世界。我注意到母親對此存疑，但還是服從父親的判斷。那個時候，他們大概覺得這不會有什麼害處，因為我們很快就會回中國。

在我七歲那年，日本侵略中國，戰爭粉碎了他們所有的計劃。他們決定留在怡保，沒有料到戰爭會經年不止，更想不到馬來亞之後會遭日本佔領。日軍擊敗英軍後，將東南亞戰線進一步北推，揮軍緬甸和印度，馬來亞的不同社群發現他們的命運在日本統治下天差地別。英國人口調查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分類被日本人利用來支持其

分化政策。日本人宣稱馬來人身為本地土著，應該受到保護，免受其他人種侵害。他們鼓勵印度人在日本支持下，為了從大英帝國獨立而戰。華人則被單獨歸類為日本的敵人，或至少不可信任，除非他們願意承認受控於日本的汪精衛南京傀儡政府。有部分華人、少數馬來人、印度人，還有許多歐亞人依舊希望英國能重返此地，他們秘密支持地下活動，但是日本佔領的主要影響仍是讓國內各大種族間的猜疑和不信任更加僵固。

我們熬過了戰爭，隨着英國重返馬來亞以及國民政府重返南京，父親母親再一次準備回中國。我們等待啟程返鄉之際，內戰仍在華北繼續，但這並未讓父母裹足不前。當我們終於動身前往中國，這趟返鄉之行已被耽擱了十多年。我進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就讀外文系。父母叮嚀我要好好努力用功，才能在戰後中國做個有用的人。他們明白我長成的模樣不同於他們原本的希望，不過父親依然樂觀認為念幾年大學，和中國教師、同學們一起生活，就能把這些都彌補回來。母親比較務實，思考我能派上什麼用場。最樂觀來看，由於我擁有外國教育背景，她希望也許我能當外交官報效國家。

最終我在中國住的日子不如父母希望的長久，他們認為如果我在中國多住幾年，就可以變得更像中國人。我轉身離開了向斯大林的蘇俄靠攏、之後更激烈抨擊傳統的那個中國；我既非這個新中國想要的中國人，也非父親所希望的致力於成為「有為有守之公民」的中國人。父親熱愛的中國熬不過上個世紀的種種苦難。父母希望國民黨能夠取勝，也試着安頓下來，在南京展開新生活，然而事與願違。那年冬天，父親病危，父親學校提供的生活條件過於惡劣，母親認定父親不

可能在這種狀況下再撐一個冬天，堅持返回怡保。1948年底，在父母動身往馬來亞的九個月後，南京政府的局勢已經無可挽回，我也拋下大學學業和父母一樣回到馬來亞。印尼和越南的獨立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而英國政府1948年決定必須對馬來亞共產黨展開軍事鎮壓，這場稱為「緊急狀態」的衝突於焉爆發。我這個階段的人生於是和戰爭不可思議地密不可分，以至於我幾乎將戰爭視為常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